



中国

近现代女子教育

● 黄新宪 著

ZHONG GUO
JIN XIAN DAI
NU ZI JIAO YU

福建教育出版社

(闽)新登字 02 号

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

黄新宪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建医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6.625 印张 166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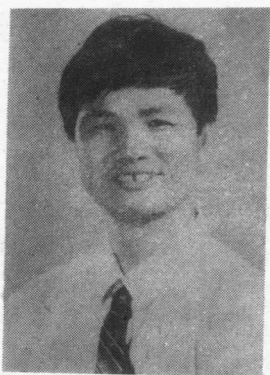
1992 年 6 月第 1 版

199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100

ISBN 7-5334-1121-8/G·799

定价:3.50 元



黄新宪，1954年生，福建福州人。1982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大教育系，现为《教育评论》双月刊主编、副编审。近年来在《社会科学》、《东北师大学报》、《湖南大学学报》等公开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70篇。单独撰写并出版《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反思》、《张之洞与中国近代教育》、《中国考试发展史略》等书，与人合编的《中外教育史大事对照年表》、《教育变革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教育热门话题综论》、《教育新视野》等书也已公开出版。1991年被日本国际教育学会接纳为会员。

前 言

百余年来，女子教育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演变成熟，社会变迁对女子教育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而女子教育本身也以多种方式对社会变迁发生着作用，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女子教育是社会发展与变革的产物，伴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演进。某一具体时代社会的性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社会形态变化的趋势，无不对女子教育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这种影响又通过女子教育内部诸因素的作用促进或阻碍女子教育的发展。当然，女子教育在随着社会渐进的过程中，也不断地摆脱历史的重负，不断地丰富自己，增添时代进化的内容，这就使得女子教育带有鲜明的时代特性。同时，女子教育的发展同近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一样，是异化和同化的对立统一，表现为既要变革自身的陈规旧律，又要从文化教育传统中寻求变革的依据，在吸收外来的先进的女子教育思潮和经验的同时也不放弃历史的传统。如同一切文化教育建构一样，女子教育虽然能够超越所处的文化背景，但却无法脱离时代，这种传统与反传统的二律背反，促使女子教育只能在矛盾中缓慢发展。

但是，女子教育并非被动地接受时代和社会的影响，它通过对自身能量的调节和人才的造就，推动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可以

说，某一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变迁，是同妇女接受教育、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适应的，而社会的衰退则同妇女自由程度的减少有着密切的关系。妇女权力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准则，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没有妇女的介入，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从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加以衡量。知识女性在改造社会，促进社会良性循环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这是女子教育最重要的成果。纵观社会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历史发展处于大转折、大变革时期，面临着除旧布新，继往开来的趋势，社会往往迫切需要动员不同性别的人们去探索、去实践，这就使一向受人歧视的女性与男性一样，获得了广泛的机遇，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发挥，社会也因她们的介入而增添了变革的重要力量。女子教育与社会变迁之间主要通过所培养的人才进行联系沟通，整体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决定了妇女介入社会变迁的程度和水准。除此之外，先进的社会理论和思潮、社会本身的需要、女性意识与大众意识的沟通程度等也都对二者之间的联系产生重大的影响。可见，女子教育不单纯是一个教育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仅通过教育内部的改革来促进女子教育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对影响其发展的各种外部因素进行改革和调整，如改变社会对女子接受教育的偏见，增加女子就业机会，提高女性从业人员的待遇，建立多种社会服务设施，等等。另外，发展女子教育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具备各种社会条件，发展规模和速度取决于其社会效果而不是某个集团和个人的主观愿望，这一点也已被百余年来女子教育的演变过程所证实。

今天，大多数的女子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但由于历史和现实中种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妇女社会化的起点还不高，许多女子还不能将自身做为认识对象进行客观的科学考察，其个人素质还有待提高，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还没有完全实现。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和探讨近现代女子教育的嬗变和特色，对进一步加强当

代的女子教育，提高女子素质，培养出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具备相应知识能力的女公民，进而推动文明的实现，将不无裨益。由此，笔者撰写了这本小书。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介绍了变革背景下的晚清女子教育思潮和以秋瑾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女性的女子教育观。第二章阐明了近代女子教育发展的曲折历程、时代特色、社会效应等。第三章围绕社会改造问题，论述了民国时期一些著名人物的女子教育观。第四章介绍了民国时期女子教育的演进。第五章分析了教会女子教育在中国出现与发展的状况。第六章分别展示了清末民初、“五四”运动、抗日救亡运动三个重大历史时期进步知识女性的作用。限于水准，本书必然存在许多疏漏，希望能得到学术界同行的批评和指正。

本书在撰写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福建教育出版社和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有关同志的支持和帮助，朱平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著 者

1992年4月于榕城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社会大变动与女子教育思潮的兴起	(1)
一 变革背景下的晚清女子教育思潮	(1)
二 进步知识女性的女子教育观	(10)
第二章 妇女解放氛围中的近代女子教育	(25)
一 女子教育从萌芽到勃兴的曲折历程	(25)
二 女子教育的鲜明时代特色	(32)
三 女子教育的社会效应	(47)
第三章 以社会改造为目标的现代女子教育思潮	(51)
一 孙中山的与三民主义紧密相联的女子教育观	(51)
二 蔡元培论女子教育的革新与发展	(55)
三 向警予对女子教育与社会变革关系的探讨	(65)
四 庐隐笔下的女子教育状况及对知识女性命运的揭示	(76)
五 鲁迅的以改造国民性为主旨的女子教育观	(84)
六 陶行知对女子教育的社会价值的体认	(92)

第四章	民国时期女子教育的演进·····	(103)
一	民国时期各类女子教育的展示及分析·····	(103)
二	从平民女学到中国女大——中共创办 女子教育的初步尝试·····	(115)
第五章	教会女子教育在中国的出现与发展·····	(131)
一	西学东渐与近代教会女子普通教育·····	(131)
二	辛亥革命后教会女子普通学校的办学特点·····	(142)
三	颇负盛名的教会女子大学·····	(150)
四	基督教女青年会在华开展的教育活动·····	(170)
第六章	进步知识女性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176)
一	清末民初进步知识女性群体的崛起与社会的变革 ·····	(176)
二	“五四”运动中进步知识女性社会政治意识的觉醒 ·····	(191)
三	抗日救亡运动中进步知识女性角色意识的增强 ·····	(196)

第一章 社会大变动与女子教育思潮的兴起

戊戌变法前后，社会处于急剧变动之中，受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一批富有改革精神的中国人提出了许多变革社会的见解，形成了一股思想开放的潮流。与此同时，女子教育思潮也应运而生，并逐渐趋于成熟，对封建制度和旧的社会传统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对社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女子教育思潮的兴起既是社会大变动的产物，又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剧变。

一 变革背景下的晚清女子教育思潮

晚清，对兴女学抱有热切愿望的是一些受到西方影响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在著述中大力宣传兴女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提出了许多发展女子教育的建设性意见，逐渐形成了一股颇有气势的女子教育思潮。这股思潮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对妇女解放和社会变革产生了积极效应，影响十分深远。

进步知识分子强调了女子教育对促进社会生产力解放的重要意义。当时流行一种“生利、分利”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类社会里存在两种人，一种人通过劳动产生出物质财富，称为“生利之人”；另一种人接受社会财富分配，消费物质，称之为“分利

之人”。进步知识分子普遍借用这一理论来论证在中国实行女子教育的必要性。郑观应指出，广东的男子多外出谋生，妇女在家，因为不读书，不了解三从四德，不了解人情物理，不知道稼穡之艰难，只是整日里与三姑六婆往来，听其愚惑，或者打牌、拜佛、看戏听歌，在生活上不知量入为出，结果将丈夫或儿子寄回的薪水浪费殆尽，待其夫或其子返家了解真相后，憾恨致病身亡者颇多。这表明，妇女如果缺少教育，就毫无谋生之本领，只能在家坐吃山空。梁启超认为，妇女不学习不能获得正当职业，只能仰仗男人抚养。他断言，二万万女子纯属分利之人，而无一个是生利者，能够生利的男子就像对待犬马奴隶那样来对待不能生利的女子，使得女子的地位十分低下，而男子终年劳动的收入不足以赡养妻儿，所以男子也很苦。要扭转这种状况，就应该让女子接受教育，掌握求生的本领，一旦原先没有职业的妇女加入到劳动大军中，那么全国所生产的物质财富必然骤增一倍。严复指出，在中国4亿人口中，妇女居其半，而妇女中的不识字者，又居十之八、九，即便偶然有一、二知书者，亦不过以其余力，粗解词章。女子既无学问，使得其毕生之道不过是敷粉缠足，凡事仰给于男人，别无生财之术。一家数口只得靠男子抚养，成为分利之人，这是国弱民贫的根源。他强调，只有女子接受了教育，能够自食其力，每个家庭都无坐食之人，家庭负担才能减轻。家累轻然后人们才有余力关注国之大事，这样或者可以挽回颓俗，转弱为强。进步知识分子普遍认识到，要缓和生利者少，分利者多的矛盾，为社会创造财富，促进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兴旺，就必须使妇女接受教育，然后参加生产劳动或社会工作，最终达到解放妇女的目的。将女子教育与社会生产力的变革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和论证，无疑是很意义的。

进步知识分子认为，实行女子教育不仅对社会有利，而且对家庭中子女的教育也具有积极意义。郑观应指出，妇女如果不知书达理，对其子女就不能使用正确的教育方法，影响保育和教养

的效果。因为“襁褓之婴，孩提之童，亲母之日多，亲父之日少，亲母之性多，亲父之性少。由六、七岁有知识，以迄十二、三岁，天性未漓，私欲未开，母教之如种花莳果，灌溉栽培，先养其根本。教子女亦然，凡衣服饮食，嬉戏步趋，皆母得而引导焉，指授焉，勉励焉，节制焉！”^①如果母亲的教育较为成功，则子女也易于健康成长，母亲的教育不善，则其子女难于健康成长。大凡有教养的妇女对其子女都能做到饮食有一定的节制，不打骂恐吓，鼓励其游戏玩耍，使气血流通，生机活泼。另外，如果母亲知书识礼，明卫生之理，所生子女未入学堂以前，必常依依膝下，事事教导，受益良多。即便对那些切音新字，也可在家先使子女娴习，不待6岁必能书写，这是因为由母亲传授较出外学习更容易。梁启超也从家庭教育的角度论证了女子接受教育的必要性。他强调，女子不学习对下一代的培养教育十分不利，儿童教育的百分之七十的工作是通过母亲进行的。如果母亲知书达理，那么便能为孩童打下知识的基础，对其今后立志，立身都能够有所帮助。他还认为，治理天下不外有两个重要的途径，一是正人心，一是管人才。不论是正人心，还是管人才，都必须从蒙养时期抓起，而“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②

进步知识分子在倡导女子教育的过程中，普遍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和优胜劣败、淘汰随之的理论，并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女子教育的经验作为参照系。郑观应在《女教》一文中介绍了欧美女学的情况，“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人生八岁，无分

① 郑观应：《致居易斋主人论谈女学校书》，全国妇联妇运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第83页，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6月版。

② 梁启超：《论女学》，《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第77页。

男女，皆须入塾训以读书、识字、算数等事。塾规与男塾略同。有学实学者，有学师道者（学成准在女塾教授女徒），有学仕学者，有入太学院肄业以广其闻见者。虽平民妇女不必如男子之博雅淹通，亦必能通书文明道理，守规矩，达事情，参以书、数、绘画、纺织、烹调之事，而女工、中馈附之，乃能佐子相夫，为贤内助矣。”^①在《致居易斋主人论谈女学校书》中，郑观应介绍了日本女学校开设的13门科目，认为日本女学的学习内容十分具体，女子通过讲求农、商、医、律、格致、制造等事，皆可与男子一起各执一业，男女之间不存在或能，或不能的差别。梁启超也认为，无论是西方全盛之国——美国，还是东方的新兴之国——日本，都依据男女平权的理论，大力兴办女学，“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②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则将波斯、印度与美国对待女子的态度做了一番比较：“波斯、印度，耻其国之有女也，不敢以示人，美利坚睹其女之多也，群喜而贺之。”以此说明“夫亦犹是人也，而轻重若此，乃知男女之轩輊，良有所因，而国家之盛衰，亦非无故也。”^③她认为欧美各国之所以能做到制度完备，人才众多，智慧潜发，风俗敦实，泱泱乎雄视万国，根本原因在于重视兴学。“其学校之制，凡男女八岁不入学者，罪其父母，幼学处所，男女并同，及其长也，别为女学以教之。”由于受到良好教育，“故美、法之女，有为臬司者，英、美之女，

① 郑观应：《女教》，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287页。

② 梁启超：《论女学》，《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第80页。

③ 康同薇：《女学利弊说》，《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第84—85页。

有为天文生者、典史者，有为传电报、司文案，医师、律师、教授、传教者，类皆与男无异”。^①从女子入学率和女校数看，“日本新树小邦，前十年间，女学生徒二百余万，教习千余员，学校三百余所。而我文明之邦，圣教之泽，神明之裔，山川之秀，二万里之地，二百兆之女，曾未有一女学以教育妇女，此何故耶？”^②提出，欲改变民穷国弱的状况，非先遍开女学以警醒之启发之不可。另一位知识女性卢翠发表《女子爱国说》，提出，向使吾辈皆如西国女子，人人读书，人人晓普通之学，人人司专门之业，不特于一家之中，大有裨益，即一国有事，亦岂无以报效于毫末哉！明白告示世人，如果把妇女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能在保家、卫国、富邦、强种中发挥重大作用。这些见解与维新派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主张是完全吻合的，具有积极意义。不过，把兴办女子教育看成是改良社会的主要手段之一，不可避免地夸大了教育的社会作用。

进步知识分子强调，女子完全有能力驾驭知识。当时有这样一种论调，即中国处于危急之秋，府库空虚，变端纷起，没有余力以创此缓不济急之女学。而且以往所设立之同文馆、武备学堂、储才学堂等年期不可为不久，章程亦不可为不善，而从未有一特出之才能为天下用。男学尚如此，而反欲望女学之必有成效，其可得乎？针对这一论调，不少进步知识分子指出，大凡天下事，虚浮者鲜实效，有志者必成功，不论是男学还是女学，只要实事求是，努力为之，就一定会获得成功。针对有人提出的几千年来男子中成绝学、立大功者不断涌现，而女子皆默默无闻，如果兴办女学，女子也必同以往一样成功者极少的论调，进步知识分子普遍表示了不同意见。康同薇认为，男女之间，只有性别差异而无

① 康同薇《女学利弊说》，《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第85页。

② 同上，第87页。

智愚之分，那种虽有巧妇，不及拙夫，虽有贤姬，不如莽汉的观念与历史发展的潮流完全不合拍。梁启超则客观指出，在学习方面，女子与男子相较有不及之处，但也有自己的优势，“其居静，其心细，故往往有男子所不能穷之理，而妇人穷之，男人所不能创之法，而妇人创之。”^①他以我国早期女留学生康爱德、石美玉为例，说明她们在学业上取得的成就连西域耆宿都赞不绝口，可见女子完全有能力掌握知识。

进步知识分子还提出了发展女子教育的具体途径。宋恕指出，宜取法日本下教育令，要求凡7岁至13岁的儿童皆须入学，不入学者罚其父母。郑观应要求，“通飭各省广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读书。其美而才者，地方官吏赠物赠扁以奖荣之。各塾女师如能教化贤才，卓有成效，咨请旌奖以劝将来。”^②陈炽在《妇学》一文中也提出了与郑观应类似的意见，要求令各省郡县，就近筹捐，广增女塾，分门别类，延聘女师。女子自4岁以上至12岁为期，皆得就学。康有为提出，宜先设女学，章程皆与男子学校同，其女子卒业大学及专门学校者如同中国举人、进士，外国学士、博士一样皆得赐出身荣衔。妇女如果学问有成，应允许参加选举、应考、为官、为师。康同薇主张，每乡设女子小学，使举国之女子粗知礼义，略通书札；每邑设女子中学校，讲求有用之学，以去邪僻之习；每一省会设女子大学，开其聪明智慧，以广其材艺心思。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起二万万沉埋之囚狱，革千余年无理之陋风，达到昌明圣道，复兴大同的目标。对于女学的教学内容和方式，进步知识分子也提出不少意见。郑观应主张，女学中的教学内容在模仿泰西女学的同时，仍应将中国诸经、列传、训诫女子之书分门别类，因材施教。蒋晚芳在《论中国创兴女学实有

① 梁启超：《论女学》，《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第78—79页。

② 郑观应：《女教》，《郑观应集》上册，第289页。

裨于大局》一文中强调，当此女学初创之时，女学的一切章程，应以讲求实效为务，要求中西学并习，以经传授读，因材施教，待其明晓字义，再继续讲解，并课以医学、算学、法学等专门之学，同时兼习纺织、烹饪等。每月教习须备课一次，并奖其勤而惩其惰。学习期满，成绩优秀者，或留校任教，或持毕业文凭到其他处所任职。即便那些不工作的女学毕业生，也可将所学到的知识用以相夫教子。进步知识分子还主张，女子不但要读书，还要“阅世”——参加社会实践。严复认为，读书者阅古人之世，阅世者即读今人之书，事本相需，不可废一。女子要阅世，就必须像泰西妇女那样走出家门到社会上去，以增广见闻。严复还批驳了那些以容易“越礼”为由反对妇女走向社会的言论。

总之，进步知识分子普遍认识到，妇女接受教育不是为了批风抹月，拈花弄草；能为伤春惜别之语，而是获得实际的学问，开阔自身的视野。他们强调，女子是一种宝贵的人才资源，男女的智力和才能并没有悬殊的差别，不让女子受教育，弃才不用是错误的，表达了效法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兴办女学，培养更多的人材，以使中国早日富强起来的良好愿望。

上述意见虽然还比较粗浅，缺乏系统性，而且尚未彻底摆脱封建伦理观念的束缚，在本质上仍属改良主义范畴，但都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改革中国的传统教育，强调了尽快确立女子教育在整个大教育中的地位的紧迫性，是希冀用资产阶级平等观念打破封建枷锁，把妇女从封建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最初尝试，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由于当时封建势力仍十分强大，守旧派视兴女学为大逆不道，全力进行阻拦，加之清政府侧重于进行军事、技艺、实业和交通等方面的“新政”建设，其它的都暂付阙如，对女子教育自然也无暇顾及。此后，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逃匿海外，其他一些倡导女子教育最力的进步知识分子因不同程度地介入维新活动而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兴女学之议顿时偃旗息鼓。但他们在女子教育问题上的超前意识为此后资产

阶级民主派人士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继续引向深入提供了十分有益的思路，为完全意义上的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广泛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瓜分惨祸迫在眉睫，有识之士对此痛心疾首，强烈要求拯救国家于危亡之中。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说过，每个时代都有她自己中心的一环，都有这种为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而在近代中国，这一环就是挽救中国于危亡之中这一总的主题，女子教育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并融进了这一主题中。

这一时期，进步知识分子普遍将兴办女子教育与国家民族乃至家庭和个人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强调发展女子教育是妇女自立自主的基础，是国家富强、民族兴旺的保障。著名的革命志士陈天华认为，在四万万中国人中，妇女占了一半，对亡国的惨祸，女子和男子要一起承受，救国的责任，女子也应和男子一样承担起来。他要求改变重男卑女、让妇女缠了双足死处闺中，一点学问也没有的状况。“凡我的女同胞，急急应该把脚放了，入了女学堂，讲些学问，把救国的担子，也担在身上，替数千年的妇女吐气。”^①他希望中国妇女通过接受教育，明白救国的道理，仿效法兰西革命中的罗兰夫人、俄罗斯虚无党人苏菲尼亚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女豪杰花木兰和秦良玉，扩张女权，拯救国家于危亡之中。兴中会会员、著名的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金一于1903年撰写并发行了被称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述妇女问题的第一部专著——《女界钟》。在这本书中，他除了批判束缚妇女的封建旧道德，提倡妇女的新公德和新品性外，还着力提倡新式的妇女教育，并将女子教育与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理论结合起来进行论述。他认为，二十世纪的世界是女权革命的时代，女子应恢复她的一切应

^① 陈天华：《警世钟》，《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第189页。

有的权利，包括入学、交友、营业、掌握财产、出入自由、婚姻自由等六种权利。金一指出：“教育者，造国民之器械也。女子与男子，各居国民之半部分，是教育当普及。吾未闻有偏枯之教育，而国不受其病者也。身体亦然，其左部不仁，则右部亦随而废。教育者，又精神之库也。无精神之教育，是禁人之食谷麦，而杂堆雀鼠以为粮者也。”^①他主张通过女子教育使妇女的面貌在各方面得到改变，具体而言，应实现八个主要目标：“一、教成高尚纯洁完全天赋之人；二、教成摆脱压制自由自在之人；三、教成思想发达，具有男性之人；四、教成改造风气，女界先觉之人；五、教成体质强壮，诞育健儿之人；六、教成德性纯粹，模范国民之人；七、教成热心公德，悲悯众生之人；八、教成坚贞激烈，提倡革命之人。”^②在传统势力还十分强大的社会环境中，金一敢于提出上述主张，显然是十分大胆的，这些主张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在妇女问题上的目标也是完全一致的。除陈天华和金一外，另一位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陈以益在女子教育方面也发表了许多颇有见地的主张。他曾与秋瑾交往甚密，受其影响，认为解决妇女问题是根治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因此，主张提倡女学，扶植女权，作为社会改良之基。通过实行男女权利和义务的平等，培养妇女的爱国心，使全国的女子都成为独立自营之大国民。他提出，女子教育应在德育、智育、体育等方面与男子教育相同，女子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女政治家、女教育家、女文学家、女哲学家、女艺术家及女医生、女商人等。陈以益的见解与陈天华、金一相比略为逊色，但其通过实施女子教育达到妇女人格独立的见解具有积极的意义，不失为一种代表进步社会潮流的有益主张。

与戊戌变法前相比，这一时期，有识之士开始把兴办女学作

① 金一：《女界钟》，《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第168页。

② 同上，第172—173页。